

## 试论沈从文小说的人物描写

李亚林

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形形色色,有船夫、水手、兵士、农人、妓女、军官、医生、少女、牧师、教授、佣人……等等,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的产生,有赖于沈从文对多种人物描写方式娴熟自如的运用。如果我们潜入其小说中进行微观分析将会发现:沈从文往往通过对人物肖像、心理、动作及语言的描写来展示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内心世界,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沈从文在上述方面并未进行细致入微地刻画,正如聂华苓所说的那样:“他的人物只是淡淡的几笔。”然而,这“淡淡的几笔”大多极为写意、传神。

如果对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将会发现,沈从文描写人物有着自己的套路,即在“关系”中描绘人物的精神风貌。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沈从文着力于表现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和人对自然的皈依。从具体的描写来看,把人当作自然中的一景一物,同时又赋予自然于人格,这是沈从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进行人物描写的重要方式。

《长河》开篇即以“人与地”为题,描写了辰河流域的人民与那片土地的生死相依:“两千年来这地方的人民生活情形,虽多少改变了些,人和树,都还依然寄生在沿河两岸土地上,靠土地喂养,在日光雨雪四季交替中,衰老的死去,复入于土,新生的长成,俨然自土中茁起。”人化解于自然之中,自然包容着人的生死,人与自然是无从分离的。边城茶峒的“近水人家都在桃花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沈从文是将“人家”作为茶峒自然景观的组成来写的,《边城》中那位不论晴雨守候在渡头的老船夫、时时遁入竹林的山野少女翠翠以及生活于青山绿水之中的那些自然天性十足的乡村男女无一不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契合。沈从文曾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景物的皈依中。”<sup>①</sup> 沈从文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间接地反映了他的这种生命体验。

沈从文描写人物时几乎消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界线,自然中的多种动物都被用作对人物的描摹,鸟兽虫鱼皆纳于笔端;有数种植物被用于描写人物的情态的顽强旺盛的生命力;把人与器物作比,更富有生活气息。有时对同一描写对象作者会同时动用这几种方法,用笔更为恣纵放达。如小说《厨子》中对妓女二圆的描写:“二圆是一个大脚大手脸子宽宽的年纪十九岁的

<sup>①</sup>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 10 卷,花城出版社 1984 年版。

女人。象她那种样子,许多人都知道是津市的特产。凡明白这个地方妇人的,就相信这些妇人每一夜陪一个陌生男子做什么丑事情,一颗心仍然不会永无变坏。一切折磨也不会使这个粗制家伙损毁什么,她的身体原是仿照一种畜生制造的。一株下贱的树,象杨柳那种东西,丢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生枝发叶,能从一切肥沃的土壤里吸取养料,这个××的婊子,就从她的营业上得到养料。这女人全身壮实如母马,精力弥漫如公猪,平时时节不知道忧愁,放荡时节不知道羞耻。”作者把二圆比作“特产”、“粗制家伙”、“畜生”、“下贱的树”、“母马”、“公猪”,这样的描写使得这个妓女的形象更为鲜明。不仅如此,沈从文还赋予自然于人的性情,《月下小景》中的月亮自始至终都“俯视”着惟佑与女孩子的爱情发展,《边城》中的白塔也好像与老船夫的生命存在着某种感应。在他的笔下,晚霞与夕阳象是一对分别的友人:“天上剩一些起花的红云,送太阳回地下,太阳告别了。”槐花镇的落雨则“象爱哭的女人的眼泪样,长年永是那么落,不断的落,却不见完。”伙夫会明的“那母鸡也极懂事,应下的卵从不吝啬过一次。”更有趣有是《渔》中的一段描写:“这时天空无云,天作深蓝,星月嵌天空如宝石,水边流萤来去如仙人引路的灯,荒滩上蟋蟀三两作声,清越沉郁,使人象到这英雄独在大石块罅隙间徘徊阔步,为爱情所苦闷而大声呼喊的情形,为之肃然起敬。”微不足道的小蟋蟀被写成了一个气度不凡的英雄,读来令人忍俊不止。象沈从文这样钟情于自然的作家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强调自然背景之于人物描写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沈从文小说的一大特色。在《断虹·引言》中沈从文曾说:“人虽在这个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有些篇章中,且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于自然中。”事实上,他的许多作品都体现着这一艺术追求。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沈从文通过政治、经济、战争等外部因素造成的人物精神世界的失常,揭示了人物灵魂的扭曲和人性的异化。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明确提及这一描写手法,“……将在另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抽带走向一个不可知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俗望,来作朴素的叙述。”《丈夫》、《贵生》、《牛》、《小砦》、《上城里来的人》等小说具体运用了这种描写方式。《丈夫》中的主人公生活在一个穷困的山庄里,在官府的盘剥下,当地老百姓“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村里许多年轻的丈夫都把妻子送到河街上卖淫为生。妻子“做了生意,慢慢地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里人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而丈夫则靠妻子卖身钱的接济苟活于世,令人怵目惊心的是丈夫认为这种事“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不公平的社会既腐化了妻子的灵魂,也泯灭了丈夫的良知。在河船上的两天中,丈夫开始还保持着平衡的心态,当水保要请他喝酒时,他觉得十分“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地唱了一首山歌”,只是到了后来目睹了妻子所遭受的蹂躏和欺凌时,丈夫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显然,在描绘“丈夫”这一人物形象时,沈从文无意于表现其性格特征,而是侧重于从社会对人的挤压这一角度,来揭示人物从良知泯灭到人性复苏的精神历程。在小说《贵生》中。“村子里住的人,因几年来城里东西样样贵,生活已大不如从前,可是一个单身汉子,年富力强,遇事肯动手,又不胡来乱为,过日子总还容易。”主人公贵生以自己的勤劳能干和硬朗自重赢得了人们的好感,杂货铺老板甚至还想招他上门做女婿。可是后来,老板还是把女儿金凤嫁给了有钱有势的财主五老爷

做小老婆了。眼看情人落入他人之手，贵生不禁对杂货铺老板产生仇恨心理，在金凤新婚之夜，贵生纵火焚烧了杂货铺和自己的房屋。在描写“贵生”这一艺术形象时，作者将他两组主要的关系中：贵生与五老爷关系体现着贵生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所遭受的政治压迫，贵生一无所有，只能依附于五老爷、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生存，贵生与杂货铺老板的关系主要体现着贵生作为穷苦农民所承受的经济压力，贵生最终未能与情人金凤结婚，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地位低下。从贵生最后疯狂的报复行为中，我们难以推断这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贵生的反抗无疑是外力逼迫所致，这也正是这篇小说的批判力量之所在，从贵生的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广大人民共同的命运。《小砦》中的桂枝本来是个乡下女子，后来几经磨难终因无以谋生而作了妓女。在描写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是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观照的。“自辛亥革命以来，这小地方因为是一条河流中部的码头，并且是一条驿道所经过的站口，前后已被焚烧过三次。因大军过道和兵败后土匪的来去，把地方上一点精华，吮剥得干干净净，所有当地壮丁，老实的大多数已被军队强迫去充夫役，活跳的也多被土匪裹去作喽罗。剩下一些老弱渣滓，自然和其它地方差不多，活在这个小小区域里，拖下去，挨下去等待灭亡和腐烂。”作者笔下的桂枝是一个靠卖身为生的妓女，也是一个道德尚未完全沦丧的普通女人，她与盐客的关系反映出她“活下去”的欲望，她与憨子的关系又体现着她“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后者流露出她人性中正常、合理的一面。作者以冷静的笔调描绘出这个妓女精神世界的麻木不仁，对于自己的不幸境遇，桂枝并未自怨自悔，相反，在金钱与感情的双重支撑下，她倒也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厨子》中的老鸨更令人惊异！她已是年过七十七岁的干瘪老妇，但她依然留恋着她皮肉生涯，并时时以嫖客的身份炫耀自己年轻时的风光荣耀。那条象征着她过去肮脏生活的绣花腰带，对于这个老鸨竟然别有一番魅力，“它在这里，它就给我一种自信，使我相信我也象你一样生龙活虎活到这个世界上过了一些日子。不止这一点点，它有时还告我留下这条带子的人，比你们还更活得尊重体面！”从老鸨这种近乎变态的自嘲中，我们可以得知人物灵魂的扭曲已达到一种令人为之震颤的地步！再如《上城里来的人》这篇小说，透过人物的自叙，我们可以看到愚昧麻木的精神面貌，由于兵匪的经常骚扰，妇女们竟然把自己遭受的侮辱看作是一顿饭的功夫。沈从文并未明确提出性本善的主张，但是通过人与社会的关系，他描写了正常、美好的人性在“变化中的堕落”和人物精神世界的荒芜。在人物描写过程中，沈从文对人物性格没有倾注太多的热情，他更注意从人物关系中揭示人物的精神现象。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沈从文大都剔除了等级观念和利益冲突，通过美好的人情关系描写人物美好的人性。

沈从文曾在《长河·题记》中说：“去乡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沈从文的许多小说正是在人情关系中描写人物的，乡情、友情、亲情、爱情是他笔下四种主要的人情关系。

乡情。也许是都市人的冷漠自私使沈从文亟需亲密无间的乡情来填补心中的孤寂，也许是时空距离造就了一种怀旧的幽幽情思，沈从文十分醉心于表现乡情以及透过乡情美而流露出的人性美。《长河·人与地》中写道：陌生过路人要买橘子，主人偏偏不卖。当陌生人失望而去时，主人会快乐地叫住他：“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再赶路，天气老早咧。”边吃边聊，陌生人才明白子园主人有所谓“只许吃不肯卖”的规矩。这种浓郁的乡情也显露了湘西人善良、美好的人性。

小说《更夫阿韩》的主人公以打更为生，街坊邻人对这位更夫十分友好，“他的吃喝的来源，就是靠他打更走过的各户人家——也可说听过他胡乱打更的人家去捐讨。”更夫对街上住户夜间安全也很关心，每当看见谁家的大门忘记关好，他总是热心地叫醒已经入睡的主人起来关门。有时看到不相识的人死在路边，他也会四处募钱将其埋葬。《一个女人》中的主人公三翠，在她的干爹死后，主动地承担起照顾其瘫痪妻子的义务。在沈从文笔下的女性群像中，三翠以其美好的人性而引人注目。作者这样赞美她：“她是一个在习惯下生存的人，在习惯下她已将一切人类美德与良心同化，只以为是这样才能生活了。”通过浓郁的乡情，边城茶桐乡村的美好人性也表露无遗：老船夫在碧溪岨渡头撑船，本是义务服务，但乘客们总是要付钱给他，老船夫却情不过，便买些烟草送人，买些茶叶泡水、供人解渴。老船夫到河街上去，水手们会送红枣给他，小商人们会送粽子给他，老船夫若要买肉，屠户总会给他最好的一块，还不肯收他的钱。老船夫与船总顺顺也十分要好，俩人一有机会便会会对饮谈天。沈从文笔下的乡情是纯乎于人之本性的感情，这种超越阶级关系、金钱关系的乡邻之情在阶级社会中无疑是缺乏现实依据的。沈从文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通过这种情感揭示了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美好人性。

友情。在《船上岸上》、《雪》、《入伍后》、《记陆弢》、《堂兄》、《黎明》、《还乡》等小说中，沈从文以抒情的笔调追忆了自己与昔日友人之间的深厚情谊。《船上岸上》、《雪》、《黎明》三篇小说写的是一位名叫叔远的朋友，叔远曾与作者一道历经千辛万苦去北京读书，在北京的会馆中，俩人常常分吃烧饼充当早餐，还一同去图书馆看书、取暖，后来叔远不堪生活的磨难，回到了乡下，不幸的是最后竟死在故乡。作者深情地追忆了他与叔远离家北上的生活经历，描绘俩人冬日捕猎的有趣生活。《入伍后》写的是一位吹箫的“二哥”，《记陆弢》写一位善于泅水的朋友，《堂兄》中写到的这位“堂兄”在军队时与作者结下深厚的情谊，堂兄不仅在生活上关照作者，而且还教诲年幼的作者怎样面对今后的人生。《棉鞋》中的友情更为动人：村弟弟两次当掉自己的衣服为作者买鞋，令其感动不已。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作者远离家人时，所有这些朋友都以一颗善良的心给作者带来一份人间的温情。回首往事，这美好的人情、美好的人性着实让沈从文感慨万分、缅怀不已。

亲情。亲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透过亲情，人情与人性的美更加表露无遗。沈从文的小说在祖孙之情、父子之情、母子之情、母女之情、兄弟之情、舅甥之情等多种亲情关系中揭示了人物的人性美。《边城》中老船夫与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感情就十分动人，对老船夫而言，“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是那个女孩子。”对翠翠而言，她已是一个失去双亲的孤雏，她唯一的依靠就是外祖父。一老一少在感情的彼此寄托中，老的渐渐衰老，小的慢慢长大。《长河》中滕长顺对天天姐妹的疼爱、《边城》中老船夫对女儿的宽厚，都体现出慈爱的父女之情，特别是老船夫的女儿背着父亲竟与军人发生暧昧关系并生下一个孩子，而老船夫并未责骂女儿，在女儿死后还承担起照顾外孙女的重担。这个善良的老人身上集中了湘西普通人的美好品德。《边城》中船总顺顺对儿子天保、傩送的严加管教、《生》中那位孤老头对儿子复仇的行为、《爹爹》中傩寿医生对夭折的独子的怀恋，则体现出父子情深。《菜园》、《道德与智慧》、《山鬼》、《传奇不奇》等小说表现了不绝如缕的母子之情，《菜园》中的“儿子”在京读书时，母亲一直牵肠挂肚，后来好不容易把儿子盼了回来，却又惨遭丧子之痛，母亲从此丧失生活的希望，终于寂寞地死去。《道德与智慧》中的杨妈之子在部队当兵，杨妈对待其他兵士也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将崇高无私的母爱博施于众。《巧秀与

冬生》、《三三》等小说表现了母女之情，巧秀的母亲被沉潭处死之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请人保住女儿巧秀的生命，三三的母亲含辛茹苦把五岁丧父的三三抚养成人，还要为女儿的未来操心。《画师家兄》、《边城》等小说反映了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玫瑰与九妹》、《长河》都写到了兄妹之情，小说《贵生》还描写了舅舅与甥之间的深厚感情。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使得亲情比其他感情更为牢固，也更能体现出人情与人性的美。

爱情。沈从文小说最美丽动人的篇章还是从爱情关系中发掘人情美，这类小说主要有《月下小景》、《边城》、《柏子》、《连长》、《阿黑小史》、《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媚金·豹子与那羊》等等。《月下小景》写的是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寨主的独生子惟佑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但是当地野蛮的风俗却不允许这对热恋的情人结合，最后，为了这份神圣、纯洁的爱情，惟佑与女孩子服毒自尽，到另一个世界去相聚了。这种义无反顾为爱情而献身的行为坦露了他们美好的心灵。《边城》中，天保和傩送兄弟俩都爱上了翠翠，但他们并未无理相争、大打出手，也没有象某些人那样虚伪地谦让。后来天保不幸地死了，傩送也将感情暂时搁置起来，去寻找哥哥的尸首，而翠翠虽几经世事的变更，却仍旧忠贞不渝的等待傩送回来。这场爱情纠葛中涉及的三个人，无一不具美好的人性，在爱情面前，三个人都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品德。《连长》中的“连长”与“寡妇”虽是露水夫妻，但他们却爱得真挚，爱得缠绵。《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主人公通过对歌立下爱的盟约，结果豹子为寻找献给媚金的小羊而迟到，媚金则以为豹子欺骗了她。最后媚金死了，豹子也自尽于媚金的身旁，为了爱情，他们不惜以死亡兑现爱的诺言，表白真情。在爱情关系中描写人物，最易于揭示人物的内在美。

沈从文那些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大多都是通过美好的人情关系描写人物身上所蕴藏着的美好人性。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①</sup>在沈从文那些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中，他也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描写了某些人的丑陋嘴脸，如《有学问的人》中的天福先生、《某夫妇》中的丈夫、妻子与他们的朋友、《绅士的太太》中的绅士、太太与其他家庭成员等，沈从文笔下的这类人物构成其人物形象群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将人物置于一定的人物氛围中，在不同文化观念的对比中描写人物也是沈从文所采用的重要方式。

文化的内涵相当广泛，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泰勒曾将文化概括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sup>②</sup>。的确，建筑交通、风俗礼仪、宗教信仰、饮食起居无一不烙有文化的印迹，文化与人的关系极为密切，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心态、行为方式。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是沈从文笔下人物生存其间的两种主要文化形态，就人物描写而言，沈从文在乡村文化氛围中对人物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进行了充满温情和爱意的描绘，在都市文化氛围中描写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力的窒息，并在两种文化的对比中描写人物美好、健康的自然天性与虚伪，做作为都市文明的对抗。

《边城》、《长河》等小说是将人物置于浓郁的乡村文化氛围中进行描写的。老船夫、船总顺顺、橘子园主人滕长顺等都是敬神守法、乐天知命、安土重迁的湘西普通人，他们生活于湘西地方文化观念之中，同时他们本身也是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薄寒》、《失业》、《八骏图》等小说则将人物置于都市文化氛围中进行描写。《薄寒》中的女主人公“她”一

<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sup>②</sup> 周汝成、田汝康：《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直渴望雄强的异性之爱,但是都市文化圈中的男子却是微温多礼少激情的怯懦者,在长期的抑郁中,“她”变得孤僻、反常,最后竟将感情轻率地临时施与一个陌生的军人。缺乏生命力的都市社会窒息了一颗年轻的心,致使“她”作出反常的举动。《八骏图》中的八位教授“皆好象有点病”,在她们眼中,“这世界没有‘新’,连烦恼也是很旧了的东西”,他们的心理在都市文明的包围中多少都有点变态,最后连那位自以为具有免疫力的教授达士先生也因一个神秘女人的留言而“害了一点很蹊跷的病”。《夫妇》、《虎雏》等小说是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对比中描写人物的。“璜”是一位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城里人,在乡村养病期间,他给一对愚昧乡民捉住示众的年轻夫妇解围,自己也被这对年轻夫妇健康自然、充满激情的生命活力所触动。这对年轻夫妇新婚不久,在回乡探亲的途中,周围美丽的环境激发了两人的俗望。于是他们便在青天白日之下享受了一段浪漫的生活,不料却被乡民捉住。这对年轻夫妇是健康活泼的乡村文化的象征,在作者看来,他们遵从自然天性的驱使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璜”则代表着都市文化中理智、苍白、缺乏活力的一面,他最后留下了那位年轻女子手中的一束野花,“嗅着这曾经在年轻妇人头上留过很稀奇过去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为一种暧昧欲望轻轻摇动着。”“璜”的心理反应体现出乡村文化对于都市文化的超越。《虎雏》中的小兵是一个来自湘西的野性难驯的蛮小子,在城里生活的“我”企图把这个小兵教育成知书达礼的都市人,最后小兵终究本性难改,在出了一桩人命案后逃离都市,“我”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小兵与“我”体现着乡村与都市两种不同的文化,通过两种形态相异的文化的冲突,作者成功地描写了小兵和“我”两个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沈从文主要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四组关系进行人物描写,这四组关系中在小说中往往也是共存其间的。通过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沈从文塑造了一大批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

我认为沈从文笔下的多姿多彩的人物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健康人”与“病态人”。“健康人”具有合理、正常、美好的人性,其突出特征表现为生命力的弘扬。沈从文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对生活的理解,他说“一个人过于爱有生的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sup>①</sup> 沈从文“美在生命”<sup>②</sup> 的学说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化地表现出来。他笔下的“健康人”大多为水手、妓女、兵士、农夫、少女等形象。“病态人”的灵魂是扭曲的,往往代表着人性的泯灭与道德的堕落,其根本特征是生命力的丧失。沈从文笔下的“病态人”大多为教授、绅士、大学生、小职员等形象。

沈从文小说中的“健康人”与“病态人”都不具备典型性格,他们都是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扁形人物“他们的性格固定不为环境所动”,“真正的扁平人物可以用一个句子描述殆尽”<sup>③</sup>。沈从文的确无意于塑造典型性格,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大都比较单一,但是这些性格单一的人物形象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艺术效果与沈从文人物描写的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① 转引自《从边城走向世界》第143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②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第143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③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